

本期聚焦的三部作品，从不同视角切入三座城市的文化肌理。《茶馆：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（1950—2000）》生动复现20世纪下半叶与茶馆相生相伴的人和事，让市井烟火里的文化基因愈发清晰。《北京红色文化的文艺寻踪》则循着文艺名家的创作踪迹与珍贵手稿，在字里行间编织出一部新中国文艺建设的城市图志。《说扬州：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》在漕运帆影与市井喧嚣中，解锁扬州古城因商而兴的文化密码。这三部作品均以严谨的史料考据与独到的文化解读，引领读者在文字中探寻城市的精神脉络。

——编者

茶馆 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与人情

□叶祝弟



本书作者深入成都居民日常生活，不仅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，还广泛挖掘报纸、日记、私人记录等文献资料，搜集茶馆文化的口述历史，通过这些细节，重构普通人的公共生活，展现了茶馆业主、顾客、艺人、掏耳匠等群体的鲜活故事，以及他们在茶馆这一公共空间中的喜怒哀乐，绘就出一幅饱满立体的城市生活图景

们的声音，这一切都是为了“得到被调查对象最真实的表达”，进而尽可能清晰地呈现真实的生活样态，“保存其中最自然的东西”。

王笛注意到，自晚清以来，逛茶馆和打麻将常常成为被批判与改革的对象，其间遭遇种种外力冲击，从繁荣走向衰败，甚至一度绝迹。但改革开放后，即便经历了各种娱乐方式的激烈竞争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逛茶馆和打麻将，“没有因为外来竞争而衰落”，反而越加欣欣向荣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。那么，茶馆为何能在风风雨雨中仍然保持生命力？王笛的观察是：第一，茶馆既是成都独特地理环境的产物，更深深植根于成都作为“天府之国”的独特地域文化。在这种地域文化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大众文化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。戏园、讲评书、自发娱乐……“喝茶听戏，以心寄戏”早已成为当地人既定的、熟稔的活法。茶馆文化是独特地域文化与人心、人性的结合体，只要人心、人性不发生相应改变，即便因外界压力一时沉寂，一旦生存环境改善，这种生活方式便会迅速恢复活力。第二，市场经济激发了经营主体的活力。茶馆经营者能随时代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方式：从最早使用留声机，到引进影戏放映设施，再到设置私人包厢、提供麻将棋牌……他们在国家、市场与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，总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。这种来自民间的自发力，值得深入研究。第三，茶馆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可以呼吸的空间。一个正常的城市社会，需要多元化的城市空间来接纳各类群体的社会交往、娱乐乃至生存需求，满足人们“更多、更丰富的公共生活的选择”。在《茶馆》中，茶馆不仅为进城谋生者提供了就业机会，还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多样需求：它可以是俱乐部，是茶艺展演赛场，是国际象棋赛场，是麻将室，是婚姻介绍所，是文人聚集地，是媒体记者的“第二新闻现场”，也是信息中心……由此可见，茶馆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承担着五花八门的功能，这种丰富性显然是其他空间难以替代的。

《茶馆：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（1950—2000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茶馆》）是历史学家王笛写给成都的又一封“情书”。绵密而生动的文字里，不仅寄托着远方游子对故土思念，更蕴含着对城市历史、现状与出路的深邃思考。“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”《茶馆》所书写的，虽只是现代中国百年历史流变中的一片微澜，却能于波光中见大气象，于方壶中窥大天地。茶馆业的百年沉浮，不仅是成都茶馆的百年史，更是中国百年生活变迁的缩影。《茶馆》涉及的议题包罗万象，比如国家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调控、人文城市研究的地方路径、微观史如何通向宏观史等。在诸多话题中，对于今日中国而言，书中提出的“恢复和保存中国的城市遗产”这一命题，似乎更为重要而迫切。相较于文学家对“百年乡愁”的执着书写，近年来因大规模城市改造、大片老旧小区快速消逝而引发的“乡愁”，却鲜有学者给予关注。

如今，没人会否认保护城市文化遗产（尤其是城市文脉）对彰显城市独特性、促进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。然而问题在于，相较于蔚为大观的国家历史叙述，城市历史叙述显得逊色不少，更不用说对城市文脉作细致梳理的著作了。此外，我们固然要呼吁回归城市传统，但值得追问的是：存在一种本质性的、一成不变的城市传统吗？还有，对城市遗产的保护该选择何种路径？是做博物馆式的“临终关怀”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其真精神？

保护城市遗产，关键在于保护城市文脉。然而，“恢复与重建中国城市的历史”实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城市文脉往往并非清晰可见，很多时候甚至隐而不现。如何抵达历史现场、如何筛选材料、采取何种立场叙述，不同的方法和立场所呈现的历史往往大相径庭。一条可行的路径是，历史学家尽可能占有丰富材料，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，才能接近历史现场。《茶馆》通过大量档案资料、新闻报道、文学作品，为我们具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以茶馆为代表的百年城市文脉的流变、曲折与发展。此外，作者借助田野调查，始终以平等的倾听者和对话者的身份，记录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，与他们随意交谈、倾听他

城市文脉既是一种空间与自然形态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人文精神。作为星罗棋布分布在成都街头小巷的茶馆，它首先是休闲、娱乐的空间。人们在这里喝茶、聊天、听戏、打麻将，交流信息，更承载着一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与处世态度。保护城市文化遗产，实质是在保护一种生活方式。城市文脉根植于城市的历史，隐

藏在日常生活中，且始终对时代保持开放。当一种传统面对外来冲击时，唯有始终保持开放、对话的态度，才具有生命力。《茶馆》以丰富案例揭示：所谓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，而是“苟日新，日日新”的，是不断吸纳时代特质、持续被发明与建构的传统。那种对城市遗产“临终关怀”式的保护已毫无意义，城市文化遗产必须作为鲜活的力量融入城市生活；换句话说，只有在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中涤荡浸润，才能真正保护、激活并赓续城市传统。

一个有温度的城市，既要有烟火气，又要有人情味。烟火气体现在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里，人情味则体现在对外来者尤其是陌生人的接纳中，而这两者相辅相成。一个健康的城市社会，既要有私人空间，更要有像街角茶馆、菜市场、快餐店、口袋公园这样的“社会活动中心”。茶馆空间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容器，在当代文明转换的进程中，日常生活日渐成为城市精神、城市品格、城市软实力的源头活水。一个日常生活不够多元丰富的城市，不可能焕发真正的活力。因此，对城市文脉的保护，关键在于守护多样化的生活空间，城市更新理应为各种生活方式留下足够的余地。

此外，王笛的叙事手法同样值得关注。《茶馆》既可以看作严谨的历史文本，也可以视为生动的非虚构作品。作者总能将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，巧妙隐藏在冷静而生动的叙述中，这无疑得益于他兼具历史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创作者的笔墨功夫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写道：“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，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。”《茶馆》中巧妙运用了大量档案材料、新闻报道，尤其是中外作家的笔记与手札，这些素材丰富了关于成都的城市记忆。城市精神借由记忆得以澄明，而记忆并非虚空。它的印记留在城市的每一处空间，每一件物体上，构成了人与城市之间深刻而隐秘的联结。城市精神不会主动呈现，甚至会如手纹般隐匿自身，需要发现者通过探寻去体认、辨识和打捞。因此，寻找城市精神的过程，正是展现城市记忆的过程。

如今，全球化的冲击让城市逐渐变得千篇一律。但《茶馆》告诉我们，瞬息万变的时代背后，隐藏着变与不变的辩证法。在新的生活形态中，重新建立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都市生活的紧密联系，重新理解地方特质、构建面向未来的城市传统，在城市文脉中梳理过去与现在的关联、联通当下与未来，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。在这一点上，该书对茶馆的繁荣、消失、恢复乃至再度繁荣的细腻描摹，为我们赓续城市文脉提供了希望与可能。

（作者系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）



《北京红色文化的文艺寻踪》，方继孝著，天津出版社，2025年6月

文化地图里的城市记忆

□张艳梅

本书以第一手文献为基石，追寻20位文艺名家在北京的创作轨迹，于红墙灰瓦间凝练成新中国文艺建设者的集体肖像。书中近百张珍贵的名家手记、实物照片为首次集中影印展示，将人物生平与创作实践紧密交织，生动还原了新中国红色文艺在北京的发展历程

站在人类社会加速迭代的宏观视野中，书写城市文化链条的内在嵌合与再生动能，复活饱含情感深度的城市记忆，重塑城市与人的伦理关联，是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文明新形态构建的重要路径。方继孝的《北京红色文化的文艺寻踪》，是作者在长期收藏相关史料、扎实考证红色文献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力作。书中记述了老舍、曹禺、赵树理、杨沫、管桦、萧军、浩然、刘绍棠、梅兰芳、焦菊隐等20位文学艺术家在北京或长或短的生活轨迹与创作历程。全书以第一手文献资料梳理绘制文艺图谱，穿插影印的156幅图片——包括手稿、往来书信、剧照、私人日记、书影等，纸墨质感与历史痕迹相互映照，清晰重现了抗战硝烟中的文艺阵地坚守、共和国建设中的文艺创作实践，以及艺术家的精神追求和经典名作的诞生过程，既为读者提供了可进入真实历史现场的叙事文本，也是一份可供后续研究循证的“红色文艺档案”。

走进城市微观历史的精神通道。对老北京而言，胡同里的烟火气、书卷气与艺术气息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一座城市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、生活节奏、审美风格与文化品格。在方继孝看来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历史叙事的重新编码，更在于讲述者的观察视角与情感立场。作者站在历史链条的延长线上，对诸多历史细节展开深度挖掘，构建起立体多维的时空叙事空间。篇章未按人物生平简单线性编排，而是采用“空间—人—作品”三位一体结构，铺展象空间中的人生与创作。开篇即呈现由北京胡同街路构成的地理方位图，围绕灯市口、中国文联芳草草地宿舍、恭俭胡同、护国寺街等文化地标，逐一追踪20位文艺大师在京的创作足迹。从“老舍：人民艺术家”启幕，到“曹禺：一生投身戏剧事业”，再至“梅兰芳：德艺双馨的京剧艺术家”，在城市地理与历史记忆的共振中，清晰勾勒出“北京红色文艺地图”。

该书以宏大历史进程为经、时代横截面为纬，以20位文艺名家生平为点、老北京胡同街路为线、城市空间为面，通过史料呈现与历史解读的相互印证、人物评传与城市变迁的彼此呼应，拓展了红色文化研究的地理叙事路径。这种“历史文献+生活场景”的双重叙事，将红色文化转化为可触摸的城市记忆，以微观视角为红色文艺生产机制填充了饱满的历史现场与生活细节。书中通过文艺名家在京生活轨迹及个人创作与文化政策的关联，展现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历程，揭示文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。

激活文化记忆中的红色密码。循着书中提到的老北京胡同与名人旧居，一步步走进光影交错的历史，既是对城市生命体的文化解码，也是心灵的叩问——这调动着我们的情感参与，唤起集体的精神记忆。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，诸多作家与艺术家的身心都经历了巨大考验。面对汹涌的历史浪潮，他们如何调整自我跟上时代方向，如何理解并书写崭新时代？方继孝努力褪去脸谱化呈现，还原艺术家的创作履历，在文化地图上标注出他们的鲜明位置，使散落的红色记忆成为连续流动的历史，不断延展为清晰的家国回响。

该书通过红色经典的再阅读，完成个体经验与时代洪流的双重书写。作者的叙述重心不在宏大事件，而是将红色文化的历史使命落到日常生活与作品生成中：老舍在《龙须沟》中倾注的现实关怀，与他车站送别友人时的情深义重；曹禺深入社会底层，为《日出》积累素材；管桦自小喜竹，亲手移栽青竹且常画竹赠友，还曾亲赴朝鲜前线创作《飞虎山》；梅兰芳与齐白石惺惺相惜，对国家和民族都怀有大爱……通过细读手稿与解析史料，作者还原了作品生成的过程与时代背景，让人们看到红色文艺并非“单色图谱”，而是在政治与审美、个人性情与家国之念的多重张力中锤炼而成。

北京作为新中国文化中心，蕴含着丰富的红色资源，该书以线条勾勒与细节晕染相结合，凸显文艺名家将个人艺术追求融入时代洪流，共同谱写新中国文艺事业辉煌篇章的历程。书信、手稿、剧照、题赠、日记等翔实资料构成扎实的叙事基础，还原了文艺经典诞生的历史，揭示出文学艺术与革命叙事互为表里的丰富内涵。

文脉传承重塑人与城的生命伦理。书写城市文化史，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更有着不可替代的思想情感价值与文学艺术价值。那些不可遗忘的历史，既是自我认知的基础，也是社会认同的核心。方继孝建构的是“活”的历史：那些作家、艺术家曾在北京生活、创作，他们留下的烙印既沉淀在时光深处，也融汇于当下的日常。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史料展陈，文化空间中那些无形的气息与流动的气韵，让城市更显厚重鲜活——既有不被时光磨灭的深刻，也有经岁月沉淀的恒久。

红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红色文化研究应兼具文献考据的“存真”与历史文化阐释的“达义”。文化功能是城市的主体功能之一，唯有赓续历史文脉、整合历史记忆、凸显地域风貌的城市建设，才能赋予城市独特气质与灵魂。崇德向善的城市文明，需建立在全体成员幸福生活的社会治理基础上。而这一过程中，科技与人文融合、技术更新与艺术创作同步，方能筑牢城市伦理的基底。该书为红色文艺史研究提供了“地方性、文本性、物质性”叠加的有效路径，既让读者在胡同砖缝间听见历史回声，也促使学界重新思考“红色”与“文艺”如何以复杂多声部的形态，在都市文化空间中交织共生。

（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）

“一方水土”是如何被想象的

□郭冰茹

城市与地方，是描述同一地理空间的不同视角。城市与乡村相对应，体现基于不同生产方式形成的生活逻辑、人际关系与价值取向；地方则与整体相关联，作为整体的一部分，其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呈现的“地方性”，突出的是这一地理空间的独特性。从根本上说，城市或地方，都是在具体参照系中对某一地理空间特征的指认：对城市的考察需置于围绕生产与消费的网络中，对地方的描述则明显带有地理边界的限定。由于关注点不同，两者虽能相互叠加却难以彼此化约，相关研究也往往独立展开。然而，《说扬州：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》（以下简称《说扬州》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历史研究的单一视角，既描述扬州的城市历史，又聚焦其地理空间的内部肌理，在时间与空间的交汇、城市与地方的叠加中，呈现出扬州城的复杂面向。

对城市而言，商品与货币奠定了其核心本质，而围绕商品生产、流通与消费建立的管理机制和契约精神，决定了它的基本品相，并影响着城中人处理人与自然、与他人及与自身的关系方式。可以说，正是商品交易和消费行为让形形色色的人聚集于城市空间，建立起与乡土社会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，重新定义了人际关系与交往模式。作为一部城市史，《说扬州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论述的。安东篱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：第一部分作为导言或概述，介绍此项研究的史学基础，以及扬州城的地理沿革；其余三部分则分别从贸易增长与城市地位确立、市政工程与城市管理、城市扩张与城乡关系变化，以及社会圈层与日常生活等方面，为这座在明清时期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城市画像。

大运河曾使扬州成为连接中国南北水运的重要关税口岸。尽管唐朝以后的人口迁移和明清时期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，让扬州在水运中的位置不再那般重要，但盐政和漕粮仍是其城市经济的基础，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。在《说扬州》中可见，商人势力崛起，财富聚集，流寓

人口增长、消费与文化休闲兴盛等城市化景观，为扬州带来了深刻变化。至今，我们仍能从“扬州园林”“扬州八怪”“扬州学派”等概念承载的城市想象中，感受到明清时期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闹——这些特点，显然是基于城市的商品性发展而来的。

从城市研究的角度考察扬州历史，的确能勾勒出这座城市从繁盛到衰败的轨迹。然而，一旦深入城市细部，单纯的城市视角便很难解释这一地理空间中出现的矛盾。比如：商人和士绅是扬州具有主导性的社会力量，可商人为何多为徽籍而非本地人？徽州女性与扬州女性的符号意义是如何建构的？当流寓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达到20:1时，这座“移民城市”是如何运转的，地方意识又怎样形成？显然，只有在城市研究中融入“地方性”视角，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解释。

“地方性”视角本质上是一种比较或参照的视角。当《说扬州》将扬州与同为水运港口的汉口、镇江相对照，将流寓人口与本地人的社会生活相对应，扬州城市的复杂性便清晰显现。扬州依托大运河与食盐专卖发展起来，是“一个人人为结构的获益者，其存在取决于国家政策”，因此它的盛衰自有其内在逻辑。扬州繁盛时期，长期居于此地的多为扬州人而非本地人。《说扬州》第四部分以《徽城、扬城》为名，既突出了徽商在扬州的重要性，也揭示了城市人口中“既突出又区分”：客居的徽商建园林、设雅集、结交文人、赈灾行善、参与地方管理，成为城市精英；本地人则靠地租或提供服务维生。而当米价暴涨、盐业凋敝，徽商便返回原籍，仅委派经纪人留场经营纳税，本地人生活自然难以维系。至于饮食起居、婚嫁祭祀等日常生活，流寓人口与本地人在相互模仿习俗的同时，也多少保留着“原籍”的某些传统。徽人与扬人构成一组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矛盾的对立项，在互为镜像中揭开了城市的褶皱，照见了生活的复杂肌理，也塑造了扬州“一方水土”的独特性。



《说扬州：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》，【澳】安东篱著，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，2022年5月

提及扬州，艺术家、文人、商人的群像，水道、桥梁、园林构成的秀丽风景，以及那些或浪漫或悲情的过往，便会浮现于脑海。学者安东篱在书中为扬州立传，通过还原明清时期的城市肌理，让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这幅生动的城市图景中清晰可见

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是安东篱研究扬州的重要参考文献。安东篱提到，李斗本可以按地方志体例，分沿革、地理、名胜、艺文、人物等部分撰写，却因感知到这座城市的“有机性质”，最终写成了“一种充满戏剧性互动的城市社会叙事”。在《说扬州》中，官方文献里市政民生、治水赈灾的记载，与诗词歌赋中声色犬马的“扬州梦”相互融合，叠加上地方志与城市史两个层面的扬州城。可以说，安东篱也以这种“戏剧性互动”的方式，串联起不同视角下的各类线索，回应了她在开篇提出的问题：“这座城市如何被想象？”
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）